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盧賓斯坦 著

張行天 譯

1. 中國工業的發展

爲要估計中國革命的動力與其前途，則對於中國工業發展的程度與速率之明確的觀念，有很重大的意義。最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經過最深刻的變化，其結果遂使社會關係，習尚與心理發生從來未有的變革。惟有在這些重大變化的基礎上，革命運動才有現時這樣雄偉的狀態，才能吸引幾百萬羣衆於此革命潮流之中。然而在經濟方面這種變動的意義和其速度，往往被人忽視；所以當其估計時遂弄出許多錯誤。此種錯誤之發生，既由於不甚熟識現時中國情形，亦源於研究方法之不正確。

就在估計中國的礦藏與原料等富源時，許多外國與俄國的考察家都做出完全無意義的比較——與美國英國之每人對於五金與原料的消費量作比較。他們只拿中國這些富源最小的估計，就毫無

根據的說，如果按照美國的消費量，則中國的鑛藏僅供幾十年之需。然而很明顯的，不要等到中國達到美國那樣迅速宏大的消費量時，這種估計，已需大大的糾正，這不僅因為新富源的發現與探求源源不絕，亦且因為採掘的技術之改變。只要看已經正確估定的煤藏，水力，鐵苗，貴金屬，棉花等等足夠為中國工業廣大的發展基礎了。最重要的是下面的事實：美國鑛務局的調查，在倫敦國際富源大會所肯定的統計材料，中國的富源佔全世界第二位。（首推英國）

中國工業的發展，與先時英美各國一樣都是由紡織工業開始的。惟其發展的速度，則超過一切歷史的先例。在最近十年中，新式紡紗工廠的紡錠數量增加了四倍，共達三百五十萬支。

然而錠數尚不足以表示中國的紡織工業，因為晝夜輪工的結果，平均每一紡錠的出產品要比戰前歐洲通常產量多兩倍。這因為西歐紡紗工業在戰後，到處都還沒有全部上工。例如中國所有的錠數反與捷克斯拉伐克小國差不多，然而中國以此數目的紡錠於1926的半年中比捷克斯拉伐克多紡出棉花五倍，比德國和法國還要多一倍半，反低於英國百分之三十。照國際紡織業聯合會的統計，在1926的全年中所消費的棉花量，各國的次序有如下的情形：第一位與前一樣為美國所佔，第二位則新為日本所得，而英國則列在第三，第四位亦與戰前無所變動，屬於印度，中國列為第五，蘇聯還在中國之下，然後輪到德，法，意等國。

按照紡織企業中，以中等設備看來，現時的中國要比戰前的俄

國爲高。每個工廠內工人的數量約2000人，比歐洲任何國家爲高。

大部分工廠的設備完全都是用新式英國的機器，而在最近幾年來多半是從美國輸入的，當1927年時，中國紡織工業每支紡錠每個織機，還都是英國的出品，而到1928年則已有百二十五萬美國錠了，就是說已佔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同時，23000織機當中，有5000已經是最新美國式的。

在大部分的大工廠裏面，機器都由各別電機轉動，這就在德國英國的紡織工業還不能如此普遍。這樣看來，中國的紡織工業就在國際範圍內，已是赫赫的數量了。紡織工業之於中國經濟上的作用，及其對於家庭生產與農村經濟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論煤之採掘，（22,700,000噸），中國現時的數量，比1905年的俄國要高得多（15,000,000）而比1923年的俄國（29,000,000）與現時的蘇聯稍差一點。

至於採鐵工業與五金工業方面，則中國尚比1905年的俄國，還落後得多。這裏，外國帝國主義的阻礙作用，表現得特別勝利。

關於五金工業的出產量，沒有一點統計的材料。五金製造工業發生還不久，可是亦已經發展到很複雜企業的創設了。例如：造船事業比戰前的俄國要發展得多。中國五十三個造船所中，有幾個可以建造整個很大的海船與汽船等等，毫不稍讓於歐洲的造船業。軍械工業亦很有可觀，中國許多兵工廠，完全製造手槍，步槍，機關槍，野炮與過山炮，無烟火藥，甚至製造毒氣。中國經濟變動還有個顯著的象徵，就是電氣廠的數目於1913年爲十二個，到1925年增

加到四十個。固然大部分的電廠是很小，僅供電燈之需，其外還有兩個製造電燈泡的工廠——是電器工業中之最精細的部門——不僅供給大部分國內需要，並且做出口品。

在其他製造工業部門中，我們亦可看見許多，企業按其大小與技術的設備，並不讓於歐洲。且舉一個顯著的例子，在幾年前秦皇島所開設的玻璃工廠，用傅爾諾的機械製法製造玻璃，為全世界最大而最好裝置的工廠。上海電氣廠亦算世界上最大電站之一可供各分站以最便宜的電流。

偉大的商務印書館，按其技術的設備，不讓於歐洲最好的印刷工廠，而規模且超過之。

同樣的例子，亦可由別的生產業部門中引來，這些都彰明昭著的表示出現代技 已將中國變成最新式的新工業化的國家而驟然過渡許多的時期。

這些全部的變動，亦反映在國際貿易上面。原料佔中國出口貨之73%，比戰前的俄國稍少。

純工廠製造品之從中國出口的，在1922年為130,000,000兩，而佔出口貨之基本作用的絲，尚不在此數。絲是算在原料裏面的，然其大部分，實是半製成品。

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在1925年約為2,700,000,000盧布，比1905年的俄國（1,500,000,000盧布）要大得多，亦稍高於1923年的俄國（2,400,000,000盧布。）

這是表示中國已以很大的程度牽入於國際商品流通範圍之

內，而國際貿易，乃是國家全部經濟的指標。

通常以爲中國現代工業的發達，只是限於幾個通商巨埠，如上海，漢口，天津，青島。

然而由現在看起來，這是不正確的。曾環遊中國的英國獨立工黨代表果隆氏於其報告中很滑稽的敘述他所發現沿鐵路的城子有百萬的人口與幾萬工廠工人。例如南通州是離上海三百里一個城子，於最近十年中很快的滋長起來，居民達百萬餘，有許多完全新式的紡織工廠，工人數萬，又有機器建設工廠，火柴與其企業，影片公司，大的電氣廠並有汽車的交通等等；又如很快工業化的城子如浙江的寧波，紹興於最近幾年內新設工廠用新式機器，很快的把家庭工業擠倒了。

杭州城內，於1926的一年中，開設下列許多新的工廠：三個棉織工廠，二個絲織工廠，二個五金製造工廠，一個製造紡織機器工廠，並附屬有幾個皮革，製帶，織襪等工廠。

就在西部僻壤的陝西，甘肅，在1915年還沒有一個用機器動力的工廠，而現在已有二十個機子的工廠了。

這種例子是很多的，這些情形表示：雖然遍於全國的現在工業，還在萌芽之時，然其於各通商區域經濟上的影響，比按生產的直接數字及職工的數目來計算要大得多。

列寧於1912年引過孫逸仙的文章，孫逸仙於其文中“承認其在實際上所應當承認者”，並寫道“中國已在龐大工業（即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五十年後將見無數的上海，或是說萬千資本主義

的財富與無階級的窮困的中心”。歐洲大戰大大促進了這個發展的速度，不要五十年後而只在十五年內我們已看見雖然不是無數的上海，總是無數斷片的上海遍佈於全國了。

中國——特別在中國的鄉村中——還有很多資本主義前的關係的遺跡，與其形形色色異常複雜的封建殘餘，這是很明顯的。技術程度與經濟形式的斑雜，實比革命前的俄國為更甚，新式技術最近的設備與洪荒時代的生產工具同時並存——有製造龐大的汽船的造船塢，製電燈泡的工廠，以最高程度機械化的玻璃工廠，與那千萬年以前的遺傳下來的木織機同時並用；有飛機，汽船，汽車，馬車，人車力，粗笨的四輪車；有用木頭做成的犁，鋤，與古代的水車，亦有最新式的深耕法，有些地方灌溉還用電機呢。

從資本主義前的家族經濟，中世紀奴隸關係的遺跡，到商業資本與高利貸借資本非常的發展，又從各種非常複雜形式的手工業，到標本形式的手工工廠，再到新式的工業與財政資本的最後階段。

很明顯的這些複雜的經濟，不能於很短期間內消滅的。然就一般講起來，所有這些關於現代中國經濟的論據，都可指示出假如你要設想中國新式工業之如怒潮海湧的秧苗，是與其周圍的環境隔絕而呈孤立的狀態，如同沙漠中的肥田一樣，那是非常錯誤的。雖中國之最新式的技術，都是從國外運進來的，然此已為其發展造成深厚的基礎了。中國的鄉村裏面，自然經濟已逐漸很快的要消失於無形了。農民經濟的破壞，與其牽入於商業流通的範圍之中，分化而成為鄉村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農民之被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

本的剝削，——這些過程在中國已進行得很遠了。

2. 中國鄉村的分化

中國鄉村中資本主義關係以前的成分，

如果否認了，或者默默過去或者看輕了那範圍廣闊，意義重大的中國鄉村經濟中資本主義前的中世紀的與半農奴制度殘餘的成分，那是過於正確研究分析中國現時的情形是有危害的。

雖是新的資本主義如潮湧入，然要否認中國鄉村中許多顯而易見可以表示其經濟社會關係非常落後的最重要的現象，那是太荒謬了。若用中國鄉村之落後情形，與城市中大工業的新式資本一比，更是顯著奪目了。

你若到鄉村中去周遊一遍，則每行一步，就都使你看到資本主義關係以前的殘跡，表演出半農奴與穀租剝削之各種形形色色，技術情形與社會關係的沉滯，族長社會習尚的餘蘊等等。

固然大地主的產業，在多數的省份中，並不佔主要統治的形式，一省以內廣大地產不過幾十，有的甚至只有幾個。然而有許多地方，我們仍可以看見比較很大的差不多純封建式的地主。

有個美國教授，威廉氏，曾為美國駐華代辦，留住中國凡三十五年，以其個人的印象敘述許多關於南京附近地主習尚的有趣情形。（參看威廉氏“中國之今昔”一書。）譬如有一個鄉村，其最大的地主，同時就是宗教的族長，法律的駐辯者，是傳統的承繼者，又是廟堂的保護人，更重要的還是廟堂裏公共倉庫的處理人，他與其青

年的兄弟兒女們同處在廣大的用磚瓦築成的房子裏面，成羣的小孩環繞其膝，奴僕家童供侍其旁，這種中世紀的古跡，就在南京之南曾受太平天國之特別驚擾的地方，亦還保存着，至於未受太平國暴動軍隊騷擾的地方，這種殘跡保存得更多。例如同威廉氏狂喜似的敘述一個豐富特殊的莊家，——有個江蘇北部純粹地主式的大地產，高堂華廈，四週環以石牆，有堅實的倉庫，滿盛從農民那裏收來的黍麥，有大批家畜與原始農業的田具，圍牆裏面有廟堂與墓地。家內除人衆口雜的家族親屬以外，還有許多僮僕，純然是族長社會的風尚。威廉氏不禁喜極，而確說此“地主”之“豐饒與快樂”。這種情境在其四圍附近農民之非常貧困與崩壞的狀況中，越發見其聳巍特立。

照威廉氏的陳述，江蘇江北類此與更大的莊家，還屬不少。有一個家庭有 400,000 畝土地，另外一個有 300,000 畝，更有許多管轄四萬萬畝土地的地主，至於較少的地產，當以百計。有許多廟宇，亦常領有三五千畝土地。直隸與山東亦有萬畝土地的家產。滿洲地產還要更大。就在東南各省，如汕頭一帶，亦有許多很大的地主。

然而一般講起來，這種大地產僅是例外的現象。不管其在附近區域有相當的意義，而農村關係的主要性質，終非由他們而決定。然而還有那些數量衆多而田地較少的地主，却有更大的意義；在中國那種環境裏，他們確是比較有權力而在經濟方面，亦更為強固些。然而不要忘記一個事實：分種地之在俄國與西歐，本是輕渺無足重輕的數量，而在中國一般地權之絕對分散，農作之非常緊張，

當主要種植方法之園藝性質（譯者按：即非常精細的意思）各種情形之下則分種地之在中國實完全有其異樣的作用在。此類地權形式之廣佈，可於農商部之調查統計見其一般，統計中指出 11% 的農家約佔全數可耕土地之 36%。而且就佃租之非常通行的事實，亦足證明上述之不謬。

這種地主與佃戶的關係，現在已受資本主義很快的打擊而崩壞，——這是下面要講的。然而仍保持着許多舊制度的遺跡，用工役，租額，奴役以及強使附郭農民賤賣其勞動等等的方法以實施半農奴式之剝削的諸形式。

有個德國農業家華諾格氏曾於其論中國農村經濟的大著中敘說這種依賴與剝削形式之彰明昭著之真相。他把中國地主分成主要的四等：第一等為大封地的地主，這是還在滿清時代所分封給各王公大臣將軍們的，——尤以在太平天國暴動以後為戰勝的功臣作酬報為多。這種地主大部分不住在鄉間，而只於鄉中留着管理人，以便收租。

他把國家官吏分為二等，他們搜括錢財投入土地——向破落農戶購買地畝。農民往往以佃戶的資格而仍耕種其所出賣的土地，有時將所賣得之錢稍為修理其農具，然而就因此變成地主的附庸，且很通常的轉成農奴的地位。

第三等為廟堂僧院，第四等為購買田地的商人。

通常佃戶中往往為負債而不得不出讓其全部農具於地主。有時佃戶且以身體為質而變成半農奴的地位，這在中國是法律上所

允許的。

有時地主向農民購買小孩，無償爲地主服侍。等到他們成長，宗主爲之娶妻，而終身爲地主田上做工，或者領受一塊田地，在農奴的條件下耕種，以納主人以租役。據華格諾的肯定，這種半農奴式的農民之在中國，其數之多，遠非意想所能料及。農民往往居住於地主所有的房舍內，一切都要依賴房主。農民不敢輕入地主的住宅，要跪着向地主講話，地主要有命令連忙盡最大的可能的去做，而把自己的工作丟開。

這種資本主義以前的奴役成份，就在與高利貸者的關係方面亦很通常的。

一切上述情形，無疑義的要阻碍鄉村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然這些農奴式剝削方法與資本主義式的剝削方法以非常複雜的形式相互錯綜而廣佈着。

在農民經濟的本身方面，經濟落後與資本主義以前的沉滯狀況之主要的基礎，首先要算生產方法的本身，這種方法差不多數千年來無所變更，大都使用手工勞働，僅採用一點粗陋的工具。直到現在所通用的還都是木鋤，鏟鋤，用打禾棒或石礮或重鏈打稻、當風簸谷等等。直到現在農民尚完全依賴自然的氣變，大旱啦，洪水啦，農民不知道其原因所在，亦就無力抵抗。

由於這種依賴的結果，必然要發生文化的落後，停滯，迷信，成見魔術等等。

而且市場關係雖然很快的侵入農村，而大部分農民羣衆，還是

終身不離其鄉曲，聽聞狹隘，僅操本地的土話，於是落後情形遂更加甚。農民每一行至隣縣，終是罕見之事。

在此種基礎之上，直到現在還保存着家長社會與部族關係的殘跡，常有整個農村居民，同屬一姓，其族長即為村長，此等村長其作用非常之大。有些地方，族裏土地，經過歲代未分割，亦有些地方，族地由全體族長平均分成很小的塊，然亦要受族人大會的干涉的。直到現在還保存着家族協助其最貧困的族人底各種形式，且亦有官廳共同負債的舊習。中國南部現在尚留着有各宗族間發生私鬥的事實。這種殘餘的現象，就在鄉村中的外表形式亦可看出，村宅四週常圍有重牆，晚間尚緊閉大門，以防不測。

最後，農奴殘跡與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尤以在政治的上層結構中表顯得特別明顯：農民全無主權，有權力者所欲所為，敲榨剝削，無所不至，非常腐敗的官廳，法庭，僱傭軍隊，民團，做其保障，農民繳納田賦重稅，而毫無到益可得，而又加以其他苛稅雜捐不一而足，以致商業陷於非常困難的境地。

一切這些政治現象，都與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的諸種經濟殘餘用千絲萬線緊相縫着。

上述種種，均給我們指示出橫在中國農村革命的面前，尚有何等重大資產階級性的任務，正為列甯在1936年俄國革命以後所論俄國農村革命的任務一樣，中國革命必須打破“舊地權的分配法”要根本“肅清中世紀式的廢物”，消滅一切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打破一切亞洲式的風尚，消滅中世紀式的程序與等級，並揭開“農民

的閉關墨守”。這樣做法，中國革命尙沒有越去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範圍。而在中國亦正爲當時的俄國一樣，資產階級在“農村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反革命性，已日益彰明昭著，因之要進行這個農村革命，就必然要用工人階級，絕對大多數的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來反對大資產階級。而爲形成並鞏固這個聯合的必需條件，已由我們上述中國鄉村於最近幾十年來，因爲資本主義很快侵入的結果，已曾遭受最深刻的破壞與動搖的情形所造成了。雖然一切上列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仍是非常廣佈而存阻碍此聯合的作用。